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初編 18

城隍爺出巡

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
一百二十年的旋盪（1879～2000）（下）

宋光宇・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輯刊

初 編

第 18 冊

城隍爺出巡

——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一百二十年的旋盪
(1879~2000) (下)

宋 光 宇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城隍爺出巡——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一百二十年的
旋盪（1879～2000）（下）／宋光宇 著——初版——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6+190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編：第 18 冊）

ISBN：978-986-322-271-2（精裝）

1. 民間信仰 2. 臺灣

733.08

102002951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322-271-2

城隍爺出巡

——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一百二十年的
旋盪（1879～2000）（下）

作 者 宋光宇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初編 30 冊（精裝）新臺幣 6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次

上 冊

陳 序

自序與謝辭

第一章 楔 子 1

第一節 緣起 1

第二節 文化變遷是一連串的事 8

第三節 臺灣的宗教市場 13

第四節 城隍信仰 18

第五節 廟是用來團結各方人士 24

第六節 微觀史、文化史和生活史 28

第二章 臺北盆地的變化 31

第一節 地圖在說什麼 32

第二節 東方遇到西方 33

第三節 把臺灣畫成三個小島 37

一、1570 年的亞洲地圖 40

二、1596 年的中華及東印度諸島精確海圖 41

三、日本江戶初期東洋諸國圖 42

四、1606 年的中華地圖（China） 43

五、1672 年的中華帝國（The Kingdom of China） 44

六、1656 年的中華帝國圖（La Chine Royavme） 45

七、1705 年的日本地圖（A map of Japon） 46

第四節 把臺灣畫成一個大島 47

一、1655 年的《中華帝國新圖》（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 47

二、1696 年的《中華東部圖》（Parte orientale

della China） 48

三、1728 年的中華沿海地區海圖 49

第五節 1640 年荷蘭人實測的臺北地圖 50

第六節 清代繪製的地圖 55

一、1695 年的臺灣府志 55

二、1704 年的康熙臺灣圖 56

三、1714 年馮秉正測繪之福島圖 56

四、1717 年的諸羅縣志 57

五、1723 年的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58

六、1756～1759 年的乾隆《臺灣輿圖》	59
七、1760 年的臺灣番社圖	61
八、1864 年鄒和的《福島地圖》	61
第七節 臺北曾經是古湖嗎？	62
一、斷陷坑說	62
二、偃塞湖說	63
三、地震說	63
四、海水入侵說	64
五、土地瞬間液化說	64
六、寒冷氣候說	66
第八節 小結	68
第三章 人的舞臺	71
第一節 原住民的爭議	71
一、究竟是誰：凱達格蘭族？或馬賽族？	71
二、社址的古今對照	72
三、淡水河流域的原住民社會	73
四、民族性與習俗	75
（一）部落間的關係	75
（二）獵頭	75
（三）劫掠	76
（四）母系社會	77
（五）經濟活動	77
第二節 漢人的移入	78
一、到海外謀生的動力	78
二、清初的移民政策	79
（一）綏撫時期（1684～1718）	79
（二）海禁時期（1718～1785）	81
三、漢人在西部的開拓	83
第四章 大舉移墾	87
第一節 漢人心目中十八世紀初的北臺灣	87
第二節 入墾臺北	89
一、康熙末年（1684～1722）	89
二、雍正朝（1723～1735）	93
三、乾隆朝（1736～1795）	94
第三節 莊園街市的形成	99
第五章 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	107

第一節	行政上的盲區	107
第二節	頂下郊拚	111
第三節	大稻埕的興起	114
第四節	霞海城隍及其廟宇	117
第五節	迎神賽會與藝閣	136
第六章	茶業的國際貿易	141
第一節	水沙連茶	141
第二節	洋行與北部茶業的興起	143
第三節	茶的品種	148
第四節	烏龍茶及其出口貿易	148
第五節	包種茶及其出口貿易	156
第六節	紅茶及其出口貿易	166
第七節	茶的外銷與迎神賽會	175
第八節	小結	179

中 冊

第七章	迎神逐疫與公共衛生	181
第一節	絕望的心理	182
第二節	十九世紀末的鼠疫	184
第三節	鼠疫來襲	185
第四節	迎神、造塔以逐黑疫	188
第五節	官方推行的公共衛生	193
第六節	臺人的陳情與療癒	198
第七節	臺人的妥協和適應	204
第八節	小結	208
第八章	傳統與蛻變（1897～1923）	211
一、	1897 年	212
二、	1898 年	213
三、	1899 年	214
四、	1900 年	217
五、	1901 年	219
六、	1902 年	221
七、	1903 年	223
八、	1904 年	225
九、	1905 年	226
十、	1906 年	228

十一、1907 年	230
十二、1908 年	233
十三、1909 年	235
十四、1910 年	236
十五、1911 年	239
十六、1912 年	243
十七、1913 年	245
十八、1914 年	248
十九、1915 年	250
二十、1916 年	252
二一、1917 年	253
二二、1918 年	255
二三、1919 年	258
二四、1920 年	261
二五、1921 年	269
二六、1922 年	271
二七、1923 年	272
第九章 登峰造極（1924～1943）	275
一、1924 年	275
二、1925 年	279
三、1926 年	280
四、1927 年	284
五、1928 年	286
六、1929 年	289
七、1930 年	294
八、1931 年	298
九、1932 年	302
十、1933 年	305
十一、1934 年	309
十二、1935 年	313
十三、1936 年	315
十四、1937～1942 年	319
第十章 文化解析	321
第一節 日方人員的參與	321
第二節 爐主的選定與爭議	325
第三節 密集的新聞報導	334

第四節	大稻埕成為臺灣的經濟重心	336
第五節	竹枝詞與膠彩畫	344

下 冊

第十一章	移風易俗	351
第一節	光復後的盡情熱鬧	351
第二節	「浪費」——端正禮俗的藉口	353
第三節	開始禁止迎神賽會	358
第四節	統一拜拜日期	360
第五節	熱鬧的頂峰（1956～1960）	366
一、	1956 年	366
二、	1957 年	367
三、	1958 年	367
四、	1959 年	368
五、	1960 年	372
第六節	移風易俗（1961～1968）	374
六、	1961 年	374
七、	1962 年	377
八、	1963 年	378
九、	1964 年	381
十、	1965 年	382
十一、	1966 年	383
十二、	1967 年	383
十三、	1968 年	385
第七節	輿論的推波助瀾	389
第八節	轉型（1971～1980）	394
一、	1971 年	394
二、	1972 年	396
三、	1973 年	397
四、	1975 年	400
五、	1976 年	401
六、	1977 年	401
七、	1978 年	401
八、	1979 年	403
九、	1980 年	403
第十二章	浴火重生（1981～2000）	407

一、1981 年	407
二、1982 年	418
三、1983 年	419
四、1984 年	420
五、1985 年	420
六、1986 年	423
七、1987 年	423
八、1988 年	425
九、1989 年	429
十、1990 年	432
十一、1991 年	435
十二、1992 年	441
十三、1993 年	443
十四、1994 年	445
十五、1995 年	446
十六、1996 年	447
十七、1997 年	452
十八、1998 年	455
十九、1999 年	459
二十、2000 年	460
第十三章 絕代風華	465
第一節 改革成功的部分：祭典形式	465
第二節 發展上的罩門	470
第三節 「吃拜拜」的文化因素	479
第四節 陽衰陰盛的人口結構	490
第五節 陳文文帶動的文化創意	494
第六節 結語	500
附 錄	501
附錄一 臺北市各區人口統計表	501
附錄二 臺北市各區人口統計表	504
附錄三 臺北市「1968 年～1990 年」各行政區人口消長增減率	506
附錄四 臺北市各區歷年的性別比例	509
參考書目	513
2012 年暗訪與繞境陣頭集錦	523

第十一章 移風易俗

在前面的八、九兩章，以編年史的方式，陳述了霞海城隍廟每年的迎神繞境活動對當時臺北經濟與社會狀況的影響。到了臺灣光復之後，這個迎神活動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面對更加快速的社會、經濟和都市發展，霞海城隍廟所在的大稻埕於整個「大臺北市」這個範圍中逐漸褪色。當大稻埕風華不再的時候，霞海城隍廟的迎神繞境和拜拜宴客活動不再能吸引幾十萬人潮。當一切都年華老去之後，剩下來的，就是白頭宮女話當年。時間的變化真的很快，才過了三十年，大稻埕、霞海城隍廟與它的祭典，從熱鬧繁華變成了「歷史古蹟」和「文化遺產」。

以下各節依照時間順序，把這六十年來臺北市、大稻埕、霞海城隍廟所經歷的變化娓娓道來。

第一節 光復後的盡情熱鬧

民國二十六年（昭和十二年，1937）七月七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進攻中國，同時在臺灣開始實行嚴格的生活管制，更在「皇民化」的政策下，企圖全面砍斷臺灣漢人的中華文化根基。迎神是傳統漢人文化的象徵，自然在所必禁。因此，從昭和十二年（1937）起，一年一度的霞海城隍迎神賽會被迫停止。雖然在表面上，大稻埕不再舉行迎神繞境，可是民間的「大拜拜」並沒有中止。每年到了農曆五月十三日霞海城隍誕辰的時候，各地前來吃拜拜的親朋好友依舊如潮水般的湧來，家家戶戶大排筵席，宴請賓客，無視於空襲警報的威脅〔註1〕。戰爭時期的生活物資是管制的，也是供應不足的。這

〔註1〕《霞海城隍誕辰 拜拜節目爭奇鬥巧 各家設宴招待吃客》，《聯合報》第5

樣的大拜拜正好可以彌補日常生活的不足，同時也是家族定期聚會的日子。到這時候，散居外地的親戚都來了，聚在一起，氣氛融洽，非常熱鬧。這種情形讓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大家對霞海城隍大拜拜的認知主要就是依靠這個時期的深刻印象。前面幾章所提的事蹟開始淡出人們的記憶之中。

民國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依據《舊金山和約》，臺灣回歸中國版圖。十月二十五日，臺灣正式光復。民國三十五年（1946）霞海城隍誕辰的迎神繞境恢復了。這年的繞境隊伍中各個陣頭都以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作為前導，並以大幅橫軸或直軸，大書「慶祝抗戰勝利，光復臺灣」〔註2〕。從民國三十五年（1946）到民國三十九年（1950）國民政府正式播遷臺灣為止，是近六十多年來，霞海城隍祭典的黃金時期，人們可以盡情的發揮，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干擾。

民國三十九年（1950）國府遷臺，正是風雨飄搖，生死存亡，危若壘卵之際。於是一定要凝聚全民的共識和力量。迎神繞境的隊伍是相當理想的宣揚愛國思想的場合。因此，到了民國四十年（1951），繞境隊伍所舉的旗幟，不再是商業廣告，也不是「慶祝抗戰勝利，光復臺灣」，而是以「反共抗俄，收復失土」為標幟。《聯合報》評論這種動作云：「這是民間利用迎神賽會之機會，做愛國運動，宣傳反共抗俄的意識。」〔註3〕顯然當時國府的主事者清楚的知道如何利用這種廟會繞境來做政治上的宣傳，民間也樂於配合。

民國四十一年（1952），霞海城隍祭典的實際狀況是這樣的：

昨（五）日為農曆五月十三日，為本市大稻埕霞海城隍誕辰，該處居民舉行大拜拜，市警局曾禁止迎神賽會，後經該處市議員數人受民眾委託，向市警局請求，抬著神輿繞境遊行。於下午四時許集隊出發，隊伍前頭的三輛吉普車，由市議員數人分乘，作開路先鋒。繼為一幅寫著「擁護蔣總統」的斗大橫軸。國旗隊，西樂隊，謝范二將軍神像，金龍陣，另有「反共抗俄打回大陸」「軍民合作打回大陸」的橫軸兩幅。最後為城隍爺神輿。神輿過處鞭炮鳴放，觀眾夾道而立。入夜各住宅及商店大宴親友，猜拳行令之聲，達於戶外，路上時見醉客顛倒。一般估計昨日之開銷，以大稻埕為四萬戶，每

版，民國四十三年（1954）六月十四日。

〔註2〕 同上註。

〔註3〕 同上註。

戶開銷四百元，則將達一千六百萬之鉅，誠為驚人之消耗。〔註4〕

這則報導前半段是在記述實際情況，在結尾卻是記者主觀的判斷，認為花錢太多，奢侈浪費。這種觀點透過報紙而流傳，慢慢的就轉化成國家施政的主要方針：杜絕浪費。在這樣的認知下，才會有各種「端正禮俗、節約拜拜」的手段。

第二節 「浪費」——端正禮俗的藉口

國民政府是以留學日本和美國的留學生為主幹的政府。留學生最大的功用就是把他們在國外看到、學到的知識，原封不動的搬進國內。凡是與之不合的舊傳統、舊習俗，統統打入「迷信」、「落伍」的行列。這是二十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慣用的技倆〔註5〕。在第一章已經有所論述，不再多言。這一章就來好好的檢視，這些喝過洋墨水以及他們的再傳弟子們如何對待所謂的「迷信」。

留學生在西方觀念的洗禮下，總是把中國傳統，民間的宗教信仰及其相關的活動，都看成是「迷信」、「落伍」的東西；主張以「人」為本，反對先前的「敬天地、禮神明」態度；以「無神論」為主要的訴求。即使有了宗教信仰，也是以西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為依歸。主政者受到這種氛圍和輿論的影響，在他們的心目中，民間所有的宗教活動，變得一無可取。又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移風易俗」這個老毛病的作祟下，以「端正禮俗」這頂大帽子作為掩護，開始「壓抑」曾經風光一時的霞海城隍誕辰的迎神繞境活動。從民國四十一年起，到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總統過世為止，前後長達三十六年的時間，一直在壓抑民間各種宗教活動。再加上臺北市其他各區的快速發展，大稻埕逐漸成為老舊社區，人口外流，繁榮不再。霞海城隍祭典及其迎神繞境和大拜拜的活動因而逐漸衰落。

從民國四十一年（1952）起，臺灣省政府開始推動「端正禮俗，節約拜拜」的改革運動。國民政府注意到，臺灣各地廟宇林立，隔不了幾天就有神

〔註4〕《大稻埕昨拜拜 城隍神輿招搖過市 宴客消耗數字驚人》，《聯合報》第5版「藝文天地」，民國四十一年（1952）六月六日。

〔註5〕相關的論述可以參看薩依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臺北市：立緒，1999；《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臺北市：立緒，2001。

明誕辰，信眾就會舉行迎神繞境和拜拜，宴客是必然的事情。在知識份子的眼光中，這些都是「迷信」和「浪費」，都是可以節省的。何況那時候，國家的經濟狀況不好，剛剛歷經民國三十七年（1948）到三十八年（1949）的一千兩百萬倍的嚴重貨幣貶值，缺乏外匯存底，也就沒有進出口貿易。又承二次大戰之弊，臺北市到處是美軍轟炸所留下來的殘垣斷壁。復原需要經費、建設需要經費、抵禦中共的入侵需要更龐大的軍費。在一個經濟狀況不佳的時代，當政者很自然的會有「能省則省」的心態。在他們的眼光中，民眾在大拜拜時大吃大喝，實在奢侈浪費，於是這些活動就成了改革的頭號對象。

指控為「浪費」的指標之一，就是毛豬的屠宰量。數字會顯示隱藏在現象背後的事實。

在第八和第九兩章顯示，有些年份會記載在霞海城隍祭典期間殺了幾條豬，以示富裕和熱鬧。最早的記錄是 1900 年。報載：

臺灣本地人喜歡吃豬肉。大稻埕屠宰場平時每天殺豬四、五十頭，有時還賣不完。一旦到了舊曆五月十二日，宰殺的豬隻達三百多頭。十三日更高達四百多頭。〔註 6〕

1908 年日文版報載，「爲了這一次的祭典，大稻埕日新街的屠宰場殺了六百多頭豬，艋舺屠宰場的屠宰量也比平日增加數倍。」〔註 7〕

1925 年，在三天的祭典期間，大龍峒屠宰場（按：應是大稻埕日新街的屠宰場）在第一天宰殺 135 頭豬，第二天 444 頭，第三天 187 頭。合計 756 頭豬。一頭豬計價 45 圓，三天共計 40,020 圓。〔註 8〕

1926 年城隍祭典的時候，一共屠宰 487 頭，較平常時增殺三百幾十頭。由於中南部上來的香客大減，需求量大減，肉販徒呼負負。〔註 9〕

1927 年的祭典期間，第一天屠豬 201 頭，第二天 440 頭，第三天 130 頭。一共殺豬 771 頭。〔註 10〕1929 年，屠豬 820 頭。〔註 11〕1932 年屠豬 605 頭，

〔註 6〕 〈加倍於昔〉，《臺灣日日新報》第 633 號，日刊 4 版，明治三十一年（1898）六月十三日

〔註 7〕 〈城隍廟大祭景況〉，《臺灣日日新報》第 3036 號，日刊 5 版，明治四十一年（1908）六月十日。

〔註 8〕 〈四萬廿圓 城隍祭で消費の豚價〉，《臺灣日日新報》第 9034 號，日刊 5 版，大正十四年（1925）七月四日。

〔註 9〕 〈豚肉敗市 各獸肉販徒呼負負〉，《臺灣日日新報》第 9388 號，日刊 5 版，大正十五年（1926）六月二十三日。

〔註 10〕 〈市民需用豚 計七百餘頭〉，《臺灣日日新報》第 9743 號，日刊 4 版，昭和

較之往年少去百頭左右。〔註12〕1934年，對於祭典期間的食品市場情況有很清楚的報導：

去四日稻江霞海城隍祭典當日，附近郡部人士固勿論，即中南部人士，來觀者不下十萬人。三日臺北屠畜場，屠殺豚畜四百七十四頭，而四日反少，屠殺三百四十九頭。午前十二時，肉已賣完，大部分不得購買。即有肉商向鄰村買入者，每斤起至五六十錢，視平日加貴二十數錢，人猶爭買。蓋是日論理要屠殺五、六百頭方足用。因意外少數，故未曾有缺乏。五日僅殺百三十五頭，乃平常日之八九成而已。又雞鴨水族蔬菜其他皆貴，斤雞六十餘錢，斤鴨三十餘錢，加貴平日四、五成云。

1935年在有關的報導中提到：

本年自本月來陰雨靡定，氣候冷如初秋。十一、二日祭典前，陰雨連綿，觀客大減，如雞鴨豬肉蔬菜，祭典數日前即暴昂。十二日屠豚數百頭，忽遇終日豪雨，生意大殺，價遂跌落〔註13〕。

這種注意祭典時的民生消費情形的報導，一直沿續到民國四十幾年。日據時代的報導只是在陳述事實，而民國四十幾年對民生消費的報導，卻是在彰顯它的「浪費」特性。可以從民國四十一年（1952）三月十七日的這一則新聞報導看出端倪來。

這則報導的大標題為：「本市毛豬兩萬六 一年消耗拜拜中 大拜拜共有三十一次 市府調查完畢將予改善」〔註14〕，清楚的顯示這種「批判浪費」的態度。在報導中詳細的分析這兩萬六千頭毛豬的消耗量是怎麼算出來的：

總計以上本市每年有卅一次「拜拜」（經常每月初二、十六「做牙」除外），其中有十四次每次光毛豬一項則需消耗一千頭左右，其餘

二年（1926）六月十三日。

〔註11〕〈城隍爺大祭典 盛況を豫想さる〉，《臺灣日日新報》第10477號，夕刊2版，昭和四年（1929）六月十九日。

〔註12〕〈不景氣之反映 霞海城隍祭典中 稻市商人收入激減〉，《臺灣日日新報》第11563號，日刊4版，昭和七年（1932）六月十八日。

〔註13〕〈霞海城隍祭典雜觀〉，《臺灣日日新報》第12645號，昭和十年（1935）六月十四日。

〔註14〕〈本市毛豬兩萬六 一年消耗拜拜中〉，《聯合報》第2版，民國四十一年（1952）三月十七日。

十七次則每次消耗五、七百頭不等，而農曆除夕消耗量達五千餘頭，全市每年消耗於拜拜之毛豬。據統計總量約在二萬六、七千頭以上，其數額實夠驚人。〔註15〕

這是估算數字跟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查民國三十六年至民國四十三年（1947～1954）的《臺北市統計要覽》有關〈本市牲畜屠宰頭數〉的記錄，得知臺北市那時候有「臺北、萬華、松山、稅捐稽徵處」等四個屠宰場，屠宰的牲畜主要是豬、牛、羊三種。每年屠宰的豬、牛、羊總數如表 11-1。

表 11-1 1947～1953 年臺北市牲畜屠宰數量

	共 計	豬	牛	羊
1947	44,919	40,714	2,386	1,819
1948	66,558	60,661	2,353	1,544
1949	69,251	66,557	1,365	1,329
1950	149,460	143,851	2,930	2,670
1951	203,854	195,193	6,174	2,487
1952	182,806	178,538	3,108	1,160
1953	218,316	213,944	3,069	1,303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要覽》第七期，1954，表 102。

我們從這個表 11-1 可以看到，在「豬」的那一項，從民國三十六年到四十二年的六年當中，每年的屠宰數量比報紙上估計的數量多出很多。就以民國四十一年（1952）來說，報上估計是年屠宰豬隻的數量是 26,000 頭，實際上有 178,538 頭，多出六倍。

霞海城隍祭典通常是在國曆的六月。我們再來看看民國 39 年至 42 年的四年裡，每到六月是不是有豬隻屠宰數量增高的現象，如表 11-2 所示，民國三十九年（1950）有增高的現象，比前一個月多宰殺了 1,393 頭。民國四十年（1951）的六月比五月多宰殺了 102 頭豬。民國四十一年（1952）的六月反而比五月少宰殺了 970 頭豬。民國四十二年（1953）六月比五月多宰了 192 頭豬。就統計數據來說，是有增高的現象，但是沒有報導中所說的那麼多。詳細情形見表 11-2。

〔註15〕同上註。

表 11-2 民國 39 至 42 年每月屠宰豬隻數量統計

	民國 39 年 1950	民國 40 年 1951	民國 41 年 1952	民國 42 年 1953
1 月	7,981	15,383	18,406	15,383
2 月	11,023	17,623	13,624	17,623
3 月	11,623	15,860	13,663	15,860
4 月	6,957	17,263	14,555	17,263
5 月	11,226	17,789	14,828	17,789
6 月	12,619	17,981	13,858	17,981
7 月	11,095	16,015	13,924	16,015
8 月	15,367	16,328	15,206	16,328
9 月	13,388	14,253	15,679	14,253
10 月	缺	15,168	15,283	15,168
11 月	缺	15,036	13,465	15,036
12 月	缺	16,444	16,031	16,444
全年	143,851	195,193	178,538	213,944
資料來源	《要覽》3 期表 75	《要覽》5 期表 87	《要覽》6 期表 90	《要覽》7 期表 87

從表 11-2，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臺北市一年之中，屠宰豬隻最多的月份是二月和八月。二月是過農曆新年，八月是中元普度。這是兩個根深蒂固的民俗節日，有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霞海城隍慶典的威力畢竟比不上這兩個傳統節慶日。

因此，我們可以說，報上的屠豬數據是憑空想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確實可信的數據，顯示民間的拜拜有多麼浪費，以期能改革被主政者認為是不良的拜拜風俗」。可惜，用錯了數據，也低估了數據。

既然在數據方面有造假的嫌疑，那麼這則報導的其他部份，也就不盡可信。記者繼續編造輿情，藉口地方士紳也有同樣的「浪費」批評，造成一種「共同的看法」。這則報導是這樣寫的：

記者日來曾訪問本市若干地方士紳，他們皆認為如此繁多之拜拜陋習，不但消耗大量物資，而且也影響社會經濟。人爲了「拜拜」，而致債臺高築。此項風尚實有徹底加以改善之必要〔註 16〕。

〔註 16〕〈本市毛豬兩萬六 一年消耗拜拜中〉，《聯合報》第 2 版，民國四十一年（1952）三月十七日。

我們無從查證文中所說的「地方士紳」是那些人。用常理來推想，當地人士早已融入那種祭祀、拜拜、宴客的文化氛圍之中，不可能有所「醒悟」而提出批評。日據末期已經有一些批評的聲音，焦點是放在紙枷、八家將的塗面臉譜這兩點「惡習」或「陋俗」，未曾涉及「浪費」這個層面。這些批評通常都是出自外來人口，只會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既有的成見來看當地的活動，發覺格格不入，率爾提出批評。總之，這樣的新聞報導其實是政令宣導，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任意編造故事，混淆視聽。

當時的大稻埕是臺北市的重心之所在。地狹人稠，於是動見觀瞻，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民國四十一年（1952）時，臺北市的人口總數是 585,459 人。大稻埕劃分成三個行政區：建成區面積是 75.64 公頃，49,237 人；延平區面積是 122.38 公頃，54,237 人；大同區面積為 295.98 公頃，50,361 人。大稻埕三區總合起來的面積是 494 公頃，占當時臺北市總面積的 7.3%。人口數是 153,835 人，占全臺北市總人口的 26.3%。就人口密度而言，建成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65,094 人、延平區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44,319 人、大同區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7,015 人。從這些數據來看，建成區是當時臺北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也是大稻埕的精華地段。在人口眾多、地方狹小的條件下，建成區和延平區的拜拜和宴客就會顯得特別擁擠和熱鬧。

許多喝過洋墨水、滿腦子科學思想的知識分子與政府官員乍看這種擁擠、熱鬧的景象，環顧當時國難當前，經濟不佳的大環境，自然不能容忍這樣的「浪費」。於是在新聞報導上，就會出現這種「捏造」的新聞報導，來反對傳統的拜拜和迎神賽會。

第三節 開始禁止迎神賽會

在日據時代，霞海城隍祭典最引人入勝之處是在迎神繞境，前面幾章已詳盡記述。到了民國四十一年（1952），這個勝景開始遭遇到大麻煩。臺北市政府開始年復一年的「下令禁止」。可是民間不會因此而屈服，展開年復一年的對抗。

吳三連是臺北市的第三任（1950 年 2 月 6 日～1950 年 11 月）和第五任（1951 年 2 月 1 日～1954 年 6 月 1 日）市長。他在民國四十一年（1952）六月三日下午邀集市議會正副議長、議員、各區的區長舉行座談。會中，吳市長正式宣布：